

徐乐的“土崩瓦解”

“土崩瓦解”这个词,《中国成语大辞典》的解释为:“像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该辞条又说:(土崩瓦解)“亦作瓦解土崩”。“土崩”与“瓦解”既是同义反复,“土崩瓦解”与“瓦解土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实,“土崩”与“瓦解”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说是“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此人便是西汉前贤的徐乐。

关于“土崩”,徐乐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陈涉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谓土崩。”在他看来,“土崩”之“崩”,原在“民困”、“下怨”而“俗乱”。在此三者之间,又有一个因果链,“民困而主不恤”则生怨,“下怨而上不知”则俗乱,“俗已乱而政不修”,则土崩之势成矣,只要有人(即使此人“起穷巷,奋棘矜,无威无财”)振臂一呼,也就应者云集,所谓“天下从风”,致使星火燎原。秦统治的垮台,也就在顷刻之间。

关于“瓦解”,徐乐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吴楚七国,号皆万乘,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者,此其故何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七国之乱其实就



谁偷走了我们的美感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在谈到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不少观众一看《天鹅湖》就等着四小天鹅出场,或是数天鹅是24只还是25只,黑天鹅旋转是不是32圈。

北京大学教授、美学家叶朗说过,现实中不少家长逼迫孩子弹钢琴、学画画,目的只是为了考级,为了升学考试时加分,根本不管孩子有没有兴趣,自然也就谈不上去欣赏音乐和绘画之美了。

最应该发现美、享受美的艺术教育中都没有了美,那么在其他知识教育中,美更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了。比如在学校中广泛开展的“奥赛”,多半是对同一题型的反复练习,如此机械的题海战术泯灭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少在“奥赛”中获奖的人表示,不愿继续从事数学研究,个别人甚至表示一辈子不愿意再接触任何数学符号。

读一读数学大师陈省身的话,我们会汗颜不已。他说:“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这是一片安静的天地,没有大奖,也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数学有很多简单而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废寝忘食,多年不决,一旦发现了光明,其快乐是不可形容的。”这位老人在弥留之际,仍舍不得数学,他说,“我要走了,要去数学的圣地希腊报到了。天堂里,一定也有数学之美。”

记得当初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出过一道题目,说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最应该信奉唯物主义,然而他们却信奉宗教。当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都觉得匪夷所思。是呀,科学与宗教不是对立的吗?为什么这些一流科学家却如此迷信呢?直到上了大学,读了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才渐渐明白,除了他们的宗教传统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科学中有那种与“最高的宗教感”类似的、令人惊悚的美。这种美,让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不得不相信,冥冥中有一个上帝或者“万能之神”在主宰着世间的一切。

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美感?又是什么时候偷走了我们的美感呢?

美在功利之外。一个人过于汲汲于名利,他的眼界和格局会非常狭小,就无法欣赏更高层次的意义——美。而如果没有了美感,是产生不了大师的。(摘自《北京青年报》6.9 徐怀谦/文)

我们的文化是否陷入粗鄙化

读一读媒体和广告上的话语,已经完全不遵循任何文字规范了。没关系,只要能抓住看客或买主就行!看一看荧屏上的人物,从乾隆皇帝到唐伯虎全都撩刀背剑蹿房越脊了。没关系,只要有收视率就好!再听一听全国各处旅游景点的小姐讲述的故事,都是胡编乱造,没关系,只要收到了门票费就“OK”!

从这无所不在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公众已然生活在这种日益粗俗不堪的环境中了。

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是你现在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还有你心怀多少文化的尊与自豪?否则,你辉煌的过去与你的关系并不大。有时,看上去甚至还有点像埃及人那种“失落的文明”呢!

在“五四”时期,外来文化涌入的是整个西方文明,知识分子可以站在前沿做出选择。我们翻阅一下那时的书刊便知,被我们的知识分子首先介绍进来的是西方的精英文化,也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

但这一次,外来的全球性流行性的商业文化是随同市场经济一起进来的。它势头强劲,所向披靡,根本不管

没有哪个词汇比“面子”更违反逻辑规则了,虽然对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它只是一种“特性”,可这个词同样让人感到难以捉摸。在中国,“面子”其实是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的含义,甚至比我们所能描述或领悟到的意味还要多数倍。

这里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着某种强烈的做戏本能。在这个国度里,戏剧几乎成为大众惟一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就如同英国人对板球、西班牙人对斗牛般乐此不疲,甚至会像演员那样装模作样地磕头行礼。

这样的情形,西方人即使不觉得荒唐,也会认为多此一举。然而,中国人真是按照戏剧里的方式来看待的。即使只有两三个听众,他也会觉得是面对一大群人,大声喊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都在这里!”假如他能借此排解掉烦恼,就会说自己是在鲜花和掌声的伴随下走下舞台的。

对中国人而言,事实永远不是最关键的,形式才首当其冲。假如某个人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用恰如其分的方式说了一番漂亮话,他那种做戏的心理就得到了充分满足。

谁也不会进入戏剧的幕后,那样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好戏都破坏掉。而在中国人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关系极为复杂,假如你能够做出类似戏剧中的那种行为,这就叫有“面子”了。如果你让他们大失所望,如果你对他们熟视无睹,如果你打断了他们的好戏,那么,你就使他们丢失了“面子”。这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问题,一旦领悟到其中的关键——如果说中国人的很多重要特性都好比暗锁的话,你就得到了一把开启这些暗锁的钥匙。

(摘自《中国人的德行》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希特勒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觉得自己有必要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应对祖上的罪行,她和兄弟都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

贝蒂娜的父亲亨茨是戈林的亲侄子。父亲过世后,亨茨被身为纳粹空军元帅的伯父戈林收养。

亨茨从来没有和贝蒂娜谈论过纳粹大屠杀,也从没谈起过叔叔戈林。贝蒂娜的祖母是个铁杆纳粹分子,对戈林十分崇拜。

“我们一起观看关于大屠杀的纪录片时,祖母会高喊:‘那是在撒谎,根本没有这种事发生。’”贝蒂娜说。

现年54岁的贝蒂娜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30多年前,贝蒂娜移民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隐居。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

对贝蒂娜来说,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极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摘自《青年参考》5.30 张文智/文)

你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审美习惯,全都推向一边。

故而,从超级市场、麦当劳、好莱坞、NBA、肥皂剧、广告,乃至歌星、影星,球星倾刻间一拥而入。而且它以报纸与电视这样的具有霸权意味的媒体为载体,铺天盖地地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对这种文化无法拒绝,只能模仿。

一个民族的文化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损害,而是影响着民族素质的下降,同时致使人们丧失文化的自尊与自信。而失去这种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才是最危险的。

前些天,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木卡拉先生在谈到中国城市在无度地模仿西方时,他说:“你们的文明问题只有你们自己来解决,别人是无法帮助的。”

我听到这话,心中一惊。我想,在我们谈论如何制止文化粗鄙化的办法之前,有个前提——我们是否承认今天的中华文化已经陷入粗鄙化,而这种粗鄙的文化正在消解和损害我们民族的精神?

(摘自《新快报》5.24 冯骥才/文)

解放南京,攻进总统府是中国革命的划时代事件。那么,是哪支部队首先攻进总统府,立下不世之功?

如同所有的军队一样,在打了胜仗之后,各个部队都要争功。在孟良崮歼灭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华东野战军的几个纵队争功了几十年,都说是自己击毙了张灵甫。可是,那些站在总统府大门上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战士是哪个部队的?几十年来居然无人认领,岂非咄咄怪事?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战役,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江面上,分三路突破。东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的第八兵团(陈士渠部)和第十兵团(叶飞部)为主力,从镇江、江阴一线突破。中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的第七兵团(王建安部)和第九兵团(宋时轮部)为主力,由芜湖一线突破。西集团由刘伯承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安庆一带突破过江。按照粟裕的作战方案,东路和中路突破之后,形成钳形攻势,从两边包抄南京。

这几个主力兵团在淮海战役之后都接受了一些国民党起义或投降的部队,在淮海战场起义的张克侠部编为32军,隶属八兵团。何基沣部编为34军,隶属八兵团。在济南起义的吴化文部编为35军,隶属七兵团。这些军队的战斗力虽然远不如主力,可多少也能起些作用。吴化文的35军被部署在长江北岸的三浦(浦口、浦镇、江浦)。

吴化文这支军队非同寻常,背景极其复杂。吴化文,山东人,1920年投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兵,由于作战勇敢,累功升任参谋长。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

1930年倒戈,背叛冯玉祥,投奔军阀韩复榘。

1938年接受蒋介石改编,任旅长、师长。

抗战初期,他曾经率部在泰安等地与日军作战。此后,与八路军不断发生摩擦,残害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员。1943年,他投靠汪精卫,当了汉奸,被委任为日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协同日军进攻八路军。1945年5月,吴化文率部投靠蒋介石,摇身一变,被任命为第五路军司令。1947年3月,吴化文带领国民党整编八十四师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1948年4月,他率部进驻济南,归王耀武指挥,防守济南西线。194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济南。吴化文在9月16日率两万名官兵战场起义。1949年2月和解放军的鲁中南纵队合编为第三野战军七兵团下属的35军。

仅仅两个月后,吴化文这支部队被派往浦口,在战略部署上本没有打算充当重要角色。哪知道,东西两路突破之后,国民党守军司令汤恩伯惊慌失措,急令南京守军撤退,准备固守上海。国民党军队连夜撤退,南京顿时成了真空地带。吴化文见机行事,立即带兵渡江,一枪不放,直取直入。对他来说太熟了。以前他在这里接受过汪精卫的召见,聆听过蒋委员长的指令,熟门熟路,根本不用向导,一点儿弯都不绕,直接赶到总统府。总统府的守卫早已树倒猢狲散,跑得踪影皆无,1949年4月24日,35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总统府,拣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由于种种原因,第35军于1950年1月撤编。从组建到消失,35军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是解放军历史上寿命最短的军队。从此,攻占总统府的战功就再也没有哪个部队来认领。

(摘自《万里山川万卷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徐滇庆/著)

郭沫若的“牵强”

郭沫若早年以其才情横溢、大气磅礴的诗篇震撼文坛,被称为“最能代表五四狂飙精神”的诗人,建国后却写下了一大批骨风尽失、简直不堪入目的诗文为世人所诟病。那么,在献媚、保身、求利之外,郭氏在炮制这类文字的时候,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动机呢?

著名作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学同学,在其回忆录《岁月与性情》里,周国平提到了当年的这样一件旧事:某日,周到郭家,闲聊中周国平有意问郭沫若,有人把毛主席的两句诗“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注解为“表达了毛主席对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得早,但必将被社会主义超过的坚定信心”,您认为如何?郭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也太牵强了吧。”于是周抖开“包袱”:“这正是郭老您写的注解呀!”郭沫若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这件旧事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官居高位的晚年郭沫若依然保持着正常的艺术直觉,“牵强”与否,一眼看破,绝未像当时某些人一样“政治化”得成了个糊涂虫;其次,他的文字当然纯属阿谀拍马,但并未倾注心力,以至于想不起某话是出于自己之口,并非挖空心思卖力讨好;第三,郭沫若“入套”后的反应是窘迫不堪、恼羞成怒,或者强词夺理、维护体面,而是“哈哈大笑”,足见其对自己的行为早有思考和判定,被人当面给个“不好看”不但在他意料之中,并且心中已怀有可对此不予以介意的有力理由——他并不是、也不可能被奴化到了骨子里、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人。

(摘自《人民文摘》谢铁骊/文)

周恩来反对在话剧中表现非洲人学《毛选》

1965年初,话剧《赤道战鼓》在中国热闹上演。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舞台上的中国演员们个个涂了黑油彩,全身黝黑,扮演黑人,敲击急促的鼓点声,热烈地呼喝,跳起丛林舞蹈,一时间在红色中国刮起了一股黑色旋风。

该剧的创作源于一场非洲政变,1961年刚刚独立的刚果(利)民主共和国遭到比利时军队的入侵,首任总理、民族英雄卢蒙巴死于政变,建立傀儡政权。2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了政变,首都十万人举行了抗议大会。

1964年11月28日,毛泽东发表了声明,支持“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外交部也布置了作业,各地剧团要拿出行动支持非洲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不久,海政文工团话剧团集体创作了话剧《赤道战鼓》,并且被各地方剧团广泛上演和改编,不管是越剧、豫剧、沪剧、京剧,还是秦腔、河北梆子等,凡有地方戏的地方几乎都遍播了《赤道战鼓》。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写组则

将之改编成舞剧《刚果河在怒吼》,北京人艺则是由英若诚等人另编了一个话剧《刚果雷雨》,因为是政治任务,这部戏被要求一周内写完,一个月后演出,大导演焦菊隐担纲执导。当时《赤道战鼓》中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周恩来来看后觉得不妥,向作曲家周巍峙,你们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因为周恩来反对大肆沙文主义,不同意“输出革命”,他觉得如果黑人是在革命前学《毛选》就有一种“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革命中的相互借鉴就又当别论了。

1973年1月,《赤道战鼓》成了喜剧,曾被中国国舆论猛烈谴责和抨击的发动政变者蒙博托以总司令的身份访问中国。他对毛泽东说,过去使我们的分裂,历史还是历史,现在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有法子反对了。(摘自《腾飞中国》6.1 何亮亮/文)

1953年的一天,小嶝岛的女民兵洪秀松领到了一个任务:把一批“对敌宣传单”散发到金门。由此开始,海峡两岸开始了一场从风筝到气球的长达20余年的空飘攻心战。

在两岸对峙的年代里,“空飘”这种独特的方式使得海峡上空出现了一种“既隔绝又对话”的微妙局面,台湾方面的普通士兵和民众通过它们,了解到大陆形势,大陆民众也通过它们,看到了“中华民国复兴基地”的工人以及后来台湾的“十大建设”,并且第一次见到了歌女邓丽君的画像。

台湾的气球飘到了印度。在海峡两岸的“空飘战”中,大陆这边一开始占有明显的优势,甚至连金门守军也承认,他们总是在“跟进”。台湾桃园人吕芳镇曾经在驻守金门的防炮209营服役,在他的回忆里,许多办法和点子都是在小嶝先搞起来,然后大嶝、晋江等地开始采用同样办法向金门“攻心”,接着是“国军”亦步亦趋地“反攻心”,“模仿他们,放风筝、搞海漂。以至于到后来,小嶝岛搞什么,‘国军’也搞什么,特别‘虚心好学’。”

1959年,台湾方面设立的两个心战大队(一个在金门,一个在台湾,其中在韩国还有一个分队)开始增加对大陆的传单散发数量。“文革”开始后,台湾方面对大陆的传单散发数量进一步增长,仅仅在1974年一年,台湾方面就向大陆散发了1.8亿张蒋介石的照片。

从1966年起,台湾方面也开始学大陆的样,施放高空气球,金门太湖畔三溪桥旁的“光华园”成为金门守军实施空飘的一个重要地点。吕芳镇回忆当年施放气球的景象:“一个个大型气球装满了心战传单,日用品、口粮等,缓缓地升起,一个接一个的沿着轨道般的路线,飘向对岸,这种景象有时非常壮观。”

这种空飘行动甚至在金门演化出了一种“放气球仪式”,每当有重要来宾到金门,金门守军就安排他们亲手放气球。最开始,台湾方面施放的气球都比较小,飞行距离也有限,随着台湾经济的恢复,台湾方面甚至开发了一种搭载量可达400磅的气球,覆盖范围可达江西、湖南,最远的到达新疆,甚至飞抵印度和中东地区,这种“巨无霸”式的气球也导致了一种让各方面都没想到的麻烦:印度人把台湾空飘气球及携带的东西运到联合国,“在联合国控告我们侵略他们的领空”。

“气球之歌”散发温情

1979年元旦,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后,这一场“空飘大战”才渐渐落下帷幕。

空飘气球这在特殊年代里形成的“战地景观”,在它持续的最后几年里,开始散发出一种温情的色彩。1980年,曾担任《海防民兵》(1955年拍摄)一片导演的张加毅到福建拍摄新片,这次片子的名字叫《思亲曲》,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解说词,除了画面,就只有与片子同名的一支歌,歌词由张加毅自己创作:

气球啊气球/银色的气球/你轻轻地飞呀慢慢地走/气球气球/银色的气球/我心里的话儿还没有说够/你见了那台湾的好姐妹/说我们思亲泪常流/故乡的荔枝已红透/亲人不常忘/来吧姐姐们/来吧姐姐们/我在海岸望亲人/同尝荔枝解思愁

风筝啊风筝/美丽的风筝/你轻轻地飞啊慢慢地走/风筝风筝/美丽的风筝/我心里的话儿还没有说够/你见了那台湾的好兄弟/说我们思亲泪常流/盛夏已去果难留/等待佳客酿美酒/来吧兄弟们/来吧兄弟们/欢聚在古老的榕树下/举杯畅饮圆酒

从这一年起,小嶝等地在施放风筝和气球时,必放此歌。它在传唱开来后,打动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台籍作曲家魏立